

# 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作用

刘书葵 崔光磊

(山西能源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00)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家国天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科学社会主义所阐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的辩证统一、人类彻底解放等主张,在哲学层面具有高度的内在共通性。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每一表现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也夯实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一世界性最先进思想体系融会贯通,以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之上的。其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科学指引,昭示了复兴的必然。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复兴

传统是变革的既有条件,新型的社会都是从以往的生命饱满的萌芽中发育和生长出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传统哲学为科学社会主义落地中国提供了扎实的文化根基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追求,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两大理论基石生成的科学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以实现整个人类的最终解放为理论宗旨和实践目标,集中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整套缜密科学的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即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规律以及演化的终极形式。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探究包括天、地、人在内的“三才”以及各自的演化轨迹入手,以哲学意义的天道、地道、人道以及三者间的辩证关系为联结点,并向自然哲学、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相关领域延伸。形成了包括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家国天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观点为核心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注重以“君子”人格,“道、心、知、行合一”等方法论,借助“德治教化”以达成“天地与我并行,万物与我为一”<sup>[1]</sup>的“人间正道”。从而在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支撑点的同时,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贯穿并导引了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并为近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命题,以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sup>[3]</sup>的宇宙观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sup>[3]</sup>的宇宙观为代表。其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化的整体,认为正是阴阳相生造就了宇宙万物。具有非常鲜明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色彩,并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高度契合。即“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sup>[4]</sup>“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sup>[4]</sup>所以,“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sup>[5]</sup>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不仅奠定了中国哲学不同流派的理论基点,也衍生出包括“天下为公”的政治观、“民为邦本”的社会观、“家国一体”的伦理观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观等传统社会核心理念在内的最高民族信仰。从先秦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sup>[6]</sup>与《汉书·谷永传》“不私一性,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sup>[7]</sup>,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天下非一姓之私”;从《尚书》中“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施政理念到《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sup>[8]</sup>的哲学命题,再到明末清初黄宗羲“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sup>[9]</sup>大同世界与民本思想始终作为中华文明的根本任务,不仅以价值引领的导向作用贯穿并深刻影响了几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道德取向,从哲学的视角揭示了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借助超越民族视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得以

不断发展与传承的关键。更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即“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sup>[10]</sup>而人类一切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无一不是实践的产物。所以，“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sup>[11]</sup>

中国古代先哲在致力于以“民”为“教化”的客体，以“善政”、“善教”作为最主要的实践手段构建与维护和谐社会生活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引导和激发“民”的主观能动性。这首先反映为中国文化中所有神祇、圣贤皆为“人中龙凤”而非如西方神话诸神般具有与生俱来的超人能力。如春秋时期随国大夫季梁就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sup>[12]</sup>；及至明代心学王阳明更是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sup>[13]</sup>导出“致良知”的哲学命题。以“民本思想”为支撑的“大同世界”内在对应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类的共同解放”与“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主张，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成为后来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开展实践的社会思想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当今成为最成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体悟。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认为，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自身不具备独立性。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反映和体现，从其深层本质来看，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的需要以及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在个人欲望的满足和社会和谐之间确立的一种平衡机制。”<sup>[14]</sup>“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sup>[4]</sup><sup>15</sup>从这个层面看，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既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本身。在中国古典哲学领域，“道”与“德”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两个重要的思想内核与支点，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为政以德、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中华文明最具标识性的民族特质；并借助于将“天下大同”作为社会道德的最高追求，以“坐而论道”和“格物致知”去引导和激发个体在社会运行中的积极性自律，进而达成社会个体与群体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层面的“知行合一”。其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中所描绘的人类道德文明新形态相通兼容，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与文化本体。

## 二、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文化的主体性，即一个民族或国家在文化构建和社会实践中与对象性个体所确立的主客体关系。通常表现为文化主体在自身文化构建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自主性与主观能动性。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必须以文化自觉为前提，并表现为对自身的文化自信。正如古语所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sup>[15]</sup>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一再证明，“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sup>[16]</sup>换言之，只有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本源”，系统和历史地了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建构与历史演进，才能在普遍与特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三个对立统一关系中更好地把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畛域的各自所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sup>[17]</sup>。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的价值必须以理论的实践来检验。价值与实践的评价关系必须置于主体的实践活动之中，且对应人的本质力量的推进以动态的方式不断加以拓展和完善。只有基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主题之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人化客体”，其所揭示的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与趋同性走向，才能借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得到验视，并在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最为有力的实践力量的同时获得了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和统一，既是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以立足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正确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经验本身所决定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到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也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和实践目标，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伟大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

更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成就和持久活力。

### 三、助力新时代背景下本体文化与外来文化双重聚合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真正共同体”、“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以及“真正人的道德”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不仅符合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追求，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厚德载物”等在内的社会价值主张“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作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sup>[18]</sup>，得以在中华文明的丰沃厚土上从生根发芽到发枝蔓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巨大成功内生动力究竟又是什么？纲举目张的答案是文化碰撞与双向选择后的相得益彰。即百余年来双方互动的实践进程早已由文化表象的“相通性”呼应，逐渐深化为两者关于“实践的价值理想”与“实践的价值实现”之间的推进。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强调，认识的目的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创造物，“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受制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其并非总是与所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保持着亦步亦趋的发展态势。即“文化”不仅能够以群体的价值理念为介体渗透并影响所处社会经济与政治活动的发展走向，同时也可以借助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压力与趋同的力量，对身处其中的成员进行观念和行为的导引和规范。因而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推手，借助“文以化人”的力量本着“扬弃”的态度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有助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转化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最为强劲与持久的“软实力”，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买上新台阶[N]. 人民日报, 2018-05-20 (1).
- [2][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4.

- [3] 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2004.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九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85.
- [6][清]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414.
- [7][汉]班固. 汉书: 卷八十五,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575.
- [8] 李修生. 朱安群. 《四书五经辞典》[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8: 100.
- [9][明]黄宗羲, 著; 段志强 译注. 明夷待访录[M]. 中华书局, 2011: 16.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六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220.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40.
- [12][清]阮元校勘. 春秋左传正义[M]. 台北: 艺文印书馆第 2001: 110 页.
- [13][清]黄宗羲撰; 吴光主编. 《黄宗羲全集》第七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201.
- [14] 杜振吉. 近三十年来关于道德本质问题的研究综述[J]. 道德与文明, 2010 (2).
- [15] 习近平. 开创中澳关系更加精彩新篇章[N]. 经济日报, 2014-11-15 (2).
- [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十一册[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658.
- [17]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34.
- [18] 列宁选集: 第十九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2: 1.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西能源学院 2023 年度院级思政专项教改项目《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视角》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SZ-2023005）。

**作者简介：**刘书葵（1969—），女，河北石家庄人，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崔光磊（1989—），男，河北石家庄人，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